

双周学术

官箴品鉴②

形成合力开展秦历史文化研究

欧阳坚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秦历史文化在中国古代史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密切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只有推动相关方面的力量都参与进来，加强联合攻关，形成学术合力，才能更好还原历史真相。

加强综合研究，用全面整体的观点分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其中，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加强综合研究是重要方面。考古学主要以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社会精神，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用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叙述方式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阐释。把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东南部地区

陆续发现了一批秦早期文化遗存，出土了关联性极强的珍贵文物，能够让我们比较全面地研究进而理清秦人早期在甘肃的历史活动和发展脉络。可见，把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等相关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可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有利于更准确、更有效地探索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打破学科界限，以更开阔视野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考古发现的历史上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就秦人早期历史活动演变来说，在甘肃省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秦公大墓、早期都城遗址、贵族和平民墓葬等，与在陕西等地发现的秦人相关历史文物遗存，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只有贯通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才能较系统地分析秦人早期的活动脉络和发展演变轨迹。因此，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发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以吸收相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例如，在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西周中期秦墓中出土了带有殷商风格的陶器，通过多学科联合研究，证明秦人与商人关系密切，秦人有可能源于东方。可见，加强多区域、多部门、多学科的合作，集中力量攻关，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解读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加强资料解读，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资源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早期阶段，考古

工作通过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生动鲜活。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物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也不是仅仅依靠文物出土就能做到的。因此，加强对考古资料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考古工作者需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进一步做好文物遗址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例如，2002年湖南省里耶秦简发现后，相关方面用较短时间完成了资料整理和阐释工作，发布权威报告，极大丰富了人们关于秦代历史和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识。再如，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屈肢葬、铲足冢与洞室墓，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其是秦文化的特征。但是，随着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学科的全面解读，学界逐渐认识到是甘青土著的遗留，并非秦文化的特征。可见，对考古资料进行准确阐释和解读，能够增强历史景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从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推进创造性转化，更好以文化人、以史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比如，从商末中漓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东进关中，在整个西周近300年间，嬴秦共14代一直生活于甘肃东部地区。其首领依次是中漓、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这是秦人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和秦文化的形成期。秦文化既在甘肃实现了转型，又在兼取农耕、畜牧文明和博采六国文化精华中推陈出新，形成尚武与崇法相结合的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国家统一强盛奠定了基础。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

简言之，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将秦人的光辉历史和形成的优秀文化特质展示出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秦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秦文化的起源，有利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主席)



一家之言

家在双峰兰若边

——浙东诗路上的巾山

何薇薇

(三)

1200多年前，玉辇纵横、金鞭络绎的长安没有让官员顾况流连忘返，他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去台州担任新亭监一职。

远东海之滨的台州，在世人的印象里，还是那个“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的蛮野僻壤，是贬谪流放的去处。被唐玄宗赞为“诗书画三绝”的郑虔，便是受安史之乱牵连而被贬台州。初到台州，就遭遇了“一州人怪郑若齐，郑若齐怪一州人”的尴尬。而他的忘年小友杜甫，则把台州想象成“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的诡谲之地。

新亭监是唐朝江南十大盐监之一，在今临海市涌泉镇的新亭头，是唐时台州盐销往处州、婺州、衢州等地的管理机构。顾况之所以想到临海就职，是因为“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他对临海的向往，或许是源于谢灵运伐木开径只为一访临海幽峻，又或许是因为骆宾王久客临海写下“百重含翠色，一道落飞泉”的秋日风光。总之，他如愿得到了这份工作。

寓居临海的四年时间里，顾况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这些诗作里，后人得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生活与情感。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当属《临海所居三首》：

(一)

此是昔年征战处，曾经永日绝人行。千家寂寂对流水，唯有汀洲春草生。

(二)

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不知叠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



家在双峰兰若边，一声秋磬发孤烟。山连极浦鸟飞尽，月上青林人未眠。

山鸟飞尽，月上青林，这样淡远超旷的意境，即便凭空想象，都已经陶醉其中，彼时的顾况，应该庆幸自己不虚此职吧。他笔下的“双峰”，即是巾山，又名巾子山，位于临海市区东南隅，高百余米，两峰耸立，中垂凹谷，三面临街，南濒灵江，台州府城墙依山而走。传说古有皇华真人华胥子在此修炼多年，得道飞升之时，一阵微风将他的头巾吹落，飘然而下化作双峰长矗，便是“巾山”。

唐武德四年（621年），朝廷置台州，相传李淳风择州治临海，临海的文脉也自此兴盛。巾山以其古木葱茏、山色清丽，广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也因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诗山”。据初步统计，从唐朝开始，历代吟咏巾山的诗作辞赋多达1300余首。《台州府志》及《临海县志》皆首推巾山“为一郡游观之胜”。

唐末著名诗人任翻，就是慕名而来。任翻，江南人，因出身贫寒，步行到京师去考进士，结果落第而归，便放浪江湖，寄情山水。游至临海，恰是初秋，巾山的秋色美不胜收，任翻流连其中，便有了《宿巾子山禅寺》一诗：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映半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

这首诗的颈联，原是“前峰月映半江水”。如何“一江”少成了“半江”，其中还有一件文人雅事。相传任翻题诗离去后，突然发觉不妥。因为江边有双峰耸立，月色只能照到半江，且半是清辉，半是幽暗，明暗相映，更富诗意，遂决定返回修改。待他到题壁前，发现已有人替他改了，不禁拍掌大呼：“台州有人！台州有人！”

也许是因为巾山的清幽雅静，也许是因为临海的人杰地灵，30年后，任翻再度登临巾山，留下了新的感慨：灵江上横峰寺，三十年来两度登。野鹤尚巢松树顶，竹房不见旧时僧。

斯情斯景，实在是念念不忘，便又来了第三次，写下《三游巾子山寺感述》：清秋绝顶竹房开，松鹤何年去不回。

惟前峰明月在，夜深犹过半江来。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任翻三游巾山留下的诗篇，由于描写细腻，动静得宜，被推为吟巾山诗篇之榜首，后人愧称：“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

巾山环境清幽，空翠灵秀，自晋唐以来，山中遍布楼台寺观，峰峦、宝塔、宫观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文雅贤达对巾山的吟咏接踵不断，摩崖石刻数不胜数。坐落于双峰绝顶的大小文峰塔，是巾山的标志性建筑。古时外出游子，远远望见巾山双塔，便知离家不远了。巾山双峰间阔约五六十米，东峰大文峰塔，旧又称“文笔”，高20米，中空，有石级螺旋而上，登之可以远眺全城。西峰小文峰塔，旧又称“火星”，高17.17米，塔身较东塔清瘦。两塔原为砖木混合结构，后改为砖石结构，均为五级六面，以菱角牙子叠涩出挑。据史籍记载，双塔均始建于唐，后屡圮屡建，现存塔身系清同治年间重修。

在小文峰塔下，是巾山现存最早的古迹——华胥洞，仅可容一人大小的华胥洞，相传为当年华胥子修炼时所居。不远处的一块石壁上，有后人石刻“遗巾处”三字，边上一块平坦的巨石，百姓称之为“仙人座”。

沿着幽僻小径转到巾山的西南面，则遇见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南山殿塔。塔身秀挺如笋，旁有古樟并立，一纤一壮，相映成趣。南山殿塔虽与天宁寺毗邻，却非寺塔，而是祭祀唐代名将张巡的南山殿，承载的是百姓对和平的祈愿。

从南山殿拾级而下，是巾山最大的寺院龙兴寺。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是台州历史上的官寺，也是临海的第一大寺。朝代兴替，龙兴寺也在岁月的磋磨中屡有损毁，现存建筑系1998年按唐制恢复。寺院依山向阳，门接长阶，舟楫上下，暮鼓晨钟相伴，城墙蜿蜒相随，颇有禅意。

释与道，向来为文人所亲厚。兼具隐逸之幽和山水之胜的巾山，自然也成了历代文人的向往之地。明代临海人、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中这样形容巾山：“巾子

山，一名蛤蟆，当城内巽维，云黄华仙人上落轸于兹山也。两峰古木乱结，秀声可餐，各以浮图镇之，山腰窟处一穴，为华胥洞，其趾有黄华丹井焉，前对三台山，半山为玉辉堂，登堂见灵江来自西北，环抱于前，流东北以去。江上浮梁卧波，人往来树影中，海潮或浮白而上，百艘齐发，呼声动地，则星月黑之夕共之。”

这样奇绝的景致，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由古至今，在巾山隐居潜修或读书奋进的文人高士不计其数，因人文景致佳而览览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除了顾况与任翻，这里是北宋文豪、台州知府曾几赞为“青铜镜外翠屏绕，中有万屋鱼鳞差。古来二事不兼得，此地一览俱无遗”的佳境，也是岳飞长孙岳甫“会须竹院求余地，岁晚安闲读楚骚”的地方；北宋铁面御史赵抃认为“巾顶轩轩逢妙秋，万家云屋接丹丘”，他的前辈章得象觉得“步步云梯彻上层，回头自觉欲飞腾”；楼钥笔下，巾山“轩轩俯瞰万瓦平，佳处历历堪指名”，舒岳祥则是“我爱巾山去复回，城中平地起崔嵬”；朱熹来时，应是宿在巾山，所以有诗“蛤蟆峰头天蘸碧，梧桐井上叶飘黄。诗脾得清凉如水，云满松窗月满房”。方孝孺在巾山有所作诗：“妙静玄化机，纵意群动表。悠然悟真趣，忽觉天地小。”戚继光则是以山为势，镇守台州府，写下了“山麓高楼开重镇，辕门晓角起晴晖”。

如今，巾山作为一座伫立千年的“文化名山”，已然成为台州府城历史的见证、文化的标志。山上林木茂密，风景幽雅，百年以上古树108棵，华胥洞、三元宫、兜率宫、龙兴寺等古迹犹存，巾山塔群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通幽”“遗巾处”“枕漱”“别有天”“活泼泼活”“恩同生佛”等历代摩崖题刻见证了千百年来的岁月。在江南的真润中遇见巾山，是一种机缘，只有真正抵达的人，才会懂得她的美。千年府城，人文厚德，临海正在进行传统诗境的转型，图画新的华章宏幅，巾山作为临海的文化地标，必将与临海人民共同描绘下一个十年、百年、千年。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政协文史编辑部)

《尚书》中有“九德官人”说：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皋陶说：“啊！检验人的行为，大约就有九种美德。如果说那个人有美德，就要把他做的事一罗列出来。”禹问：“什么叫九德呢？”

皋陶说：“（九德就是指）宽厚又庄重，柔和又坚持己见，讲原则又彬彬有礼，聪明能干又兢兢业业，懂得权变又坚韧刚毅，为人正直又温和友善，坦率真挚又张弛有度，刚正又笃实，勇敢又符合道义，要诚心诚意地表彰任用那些具有九德的好人啊！每天能表现出三种美德，每天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卿大夫，就能保住他的封地；每天都能庄重地践行六种美德，辅助国家治理，作为诸侯，就能保住他的邦国。能够普遍地推行九种美德，使具有九种美德的人都能担任官职，百官百僚相互学习效法，恪尽职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政事与天象运转规律相适应，各种事情都会取得成功……”

这段话出自《尚书·虞书·皋陶谟》。在阐释这段话之前，需要了解两个知识点：

第一是《尚书》。“尚”就是上，《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记载了自尧舜至东周的历史，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记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追述古代事迹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汉代改称为《尚书》，“以为上古帝王之书”（王充语）。儒家尊其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相传经孔子搜集、编辑，用以教授门徒。全书按朝代编排，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颐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提出了很多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命题，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

第二是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皋陶是上古时期的东夷部落首领，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传说他出生于尧帝统治的时候，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至直闻名天下。皋陶的主要成就就是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坚持公平公正；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尚书·虞书·皋陶谟》中“谟”是谋划的意思，“皋陶谟”是指皋陶为舜舜谋划政事。皋陶发言的中心内容是希望舜舜继承帝尧的治国传统，使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提出修身、知人、安民三条具体建议，并以“九德”作为修身、知人的详细标准，强调君王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接着，皋陶列出上天所规定的五典、五礼、五服及五刑，建议君主据此整顿社会风俗与等级秩序，用礼仪制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用刑罚来惩治罪犯。最后，他指出天意与民意相通，上天考察政治得失要以庶民的意见为标准。

“九德”指的就是九种品德：“宽而栗”就是宽厚又庄重。宽厚的人比较随和，无可无不可，久而久之，别人就会对他失去敬畏之心。如果神态庄重，别人就不敢轻视。现实生活中的优秀领导者，都具有宽厚而又庄重的特点，不怒而威。宽厚和庄重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居官的美德。这样的领导既有群众基础，接地气，又有居上的庄严，有领导权威，才能干好工作。

“柔而立”指的是柔和又坚持己见。性情温和的人，能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但是意见多了，就存在决断上的实际困难。左思右想，怎么都难下决定。所以温和的人如果没有主见，就会陷入优柔寡断、缩手缩脚。优柔寡断的人不适合做领导，性情温和加上有主见，就变成了一种美德。

“愿而恭”意思是讲原则而彬彬有礼。讲原则的人，严格按照原则办事，不徇私情；严格遵循做人原则，不随波逐流。这种人令人敬畏，但是不一定招人喜欢。震慑力强而亲和力不足，威力大而威信不高，人们往往“敬而远之”，于是难

以德为政 以民为本

——《尚书》中的「九德官人」说

王杰

以服众。如果能做到彬彬有礼，让自己变得通达些，使得别人真切感受到自己讲原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伤害别人，别人的敬畏就变成了敬爱。

“乱而敬”指聪明能干又兢兢业业。聪明能干的人，接受新事物强，学习知识技能时，往往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但容易流于表面，舍不得下功夫钻研，而且好高骛远，喜欢干大事，不喜欢干小事。如果能做到兢兢业业，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对待，精益求精，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干成大事业。

“扰而毅”就是指懂得权变又坚韧刚毅。头脑灵活的人，善于变通，不钻牛角尖；但太灵活了，有时又缺乏根基、站不住脚。稍遇挫折，便会打起退堂鼓。因为他总是在变化中，变来变去，还是庸人一个。如果加上持之以恒的毅力，改变行为方式而不改变目标，改变处理方法而不放弃问题，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成之事。

“直而温”指的是为人正直又温和友善。正直的人，是非观念强，嫉恶如仇，看见不合理的事情就想干预，这样很容易伤害别人。如果加上温和友善的态度，在论辩是非、区分曲直时注意方式方法，小心呵护对方的自尊心，就能让对方心服口服。

“简而廉”意思是坦率真挚又张弛有度。坦率的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谈。如果没有节制，把隐私、秘密都抖搂出来，或者随意说伤害别人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坦率加上张弛有度，该谈的直言不讳，不该谈的一言不发，这是一种德行。

“刚而塞”即刚正又笃实、刚强而务实。性格刚强的人，言必行，行必果，一旦做出决定，就坚决执行。但是有时为了面子，固执己见，明知说错了，也不肯认错，仍然坚持不依；明知做错了，也不肯改变，一条道走到黑。如果能做到笃实、务实，只坚持对事情好的做法，只坚持对人对己好的做法，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强而义”指的是勇敢又符合道义。勇敢的人，无所畏惧，如果不论善恶，率性而为，只是一种恶习；只有符合道义，才是一种美德。

皋陶的言论充分体现了德政思想和民本思想。他从修身、用人的标准出发，提出了“九德”，目的就是为了让安民，强调在礼制的规范下，帝王能够“慎厥身，修思永”，以身作则，自上而下以宽厚仁慈的道德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最终达到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这种以德为政的治国方针，突显了庶民百姓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我国较早的民本思想。文中提出的“九德”准则与修己立人等思想，是对管理者全面素质的要求，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